



异彩纷呈的电视华章

——第二十七届“飞天奖”述评

王丹彦

在新中国 60 华诞来临之际,中国电视剧“飞天奖”迎来第二十七届评选盛事。《闯关东》、《士兵突击》、《金婚》、《潜伏》等一大批为观众喜爱的电视剧参加角逐,满目珠玑,精彩纷呈。本届“飞天奖”带给人们的重要讯息是:中国电视剧以产业运作的日臻成熟为基础正稳步迈向文化自觉新阶段。



本届“飞天奖”的金牌得主突出特点是:寓思想性于艺术性,讲好了故事,更讲出了思想,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审美方式,彰显了时代主流价值。《闯关东》将史诗性品格融入传奇性故事,讲述了历史大迁徙中底层百姓的生命际遇,展现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美感;《士兵突击》围绕“不抛弃、不放弃”的信念,描述了军旅生活中契合时代价值观的人生观及责任担当;《潜伏》在带给观众多元审美视角、引发种种讨论的同时,也通过主人公的形象刻画呈现了一种久远而亲切的信仰力量及其所折射的历史必然性;《金婚》用编年史的方式,讲述了分享亲情与共担磨难的中国家庭模式;《戈壁母亲》将屯垦戍边中个人与时代、命运与祖国的关系演绎成无私奉献、执着追求的生命礼赞。一部优秀的电视剧,总是能透过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和津津乐道的故事情节,在赏心悦目、引人入胜、赢得观众精神愉悦与心理认同的同时,标示时代的精神与风尚,解读先进文化与和谐文化的内涵,成为展现时代价值指标的鲜活范本。

一个民族的精神历程是一个民族弥

足珍贵的集体记忆。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直接聚焦历史变革中的民族精神特质。各个时代的典型人物与事迹,也从不同角度记录民族精神发展的足音。历史题材电视剧通过结构故事性人物关系,使大容量、多视野地再现民族精神历程转化为一种现代审美方式。在娓娓道来的故事情境中,让大众聆听岁月、感悟人生、品评英雄,重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感知民族精神家园的瑰宝,去共同对现在和未来。本届获奖作品中,《周恩来在重庆》、《井冈山》、《彭雪枫》等新作,一方面延续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信史为本的纪实风格,追求诗感的叙事策略,视野收放舒展,场景推拉有致,用镜头再现了历史、社会的巨大冲突和重大转折,将人物命运与民族命运紧密结合,还原了共和国缔造史上可歌可泣的领袖和英雄人物。另一方面在人物形象刻画上视角下移,融合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人文元素,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用生动感人的笔触,描写了一个个充满人格魅力、人文情怀和生活气息的人物形象,使中国革命史演绎成充满感动的精彩故事,令观众在审美体验中,共同领略中华

民族精神历程中的华彩篇章。

近两年,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成果丰硕,成为电视剧播出平台的主角。在本届获奖作品中,现实题材的比重最大,类型最多。集中展现了电视剧人直面现实生活的勇气和热情,也充分显示了优秀电视剧引领大众文化认知与心理疏导的优秀剧目。比如《十万人家》说明在经济全球化面前,传统企业必须重整生产要素、脱胎换骨;《漂亮的事》则在老工业基地的氛围中,形象诠释了什么叫“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战争目光》在破解现代强军的具体路径中呼唤树立前瞻性的战争观;《名校》则直面当下应试教育体制,呼吁现代教育创新;而《国家行动》聚焦三峡大移民中的干群关系,将“以人为本”的含义诠释于百姓的喜怒哀乐;《喜耕田的故事》则写出了党的惠农政策下,当代农民要与时俱进。本届“飞天奖”得主中的《静静的白桦林》、《北风那个吹》、《我是太阳》、《绝密押运》、《春草》、《奋斗》、《大工匠》、《美丽人生》、《郭海的家事》、《卫生队的故事》等,在创作上也都探求不同生活背景下不同类型人物的丰富内心世界,勾画了社会发展和时代改革大潮中中国人穿越困惑、苦闷的达观情怀与向上心态,充满生活质感地表现了对美好人性、情感和对理想的追求,为当代人的世界观、生命观、道德观、家庭观、爱情观、友情观、教育观、创业观、择业观等的探索提供了鲜活的认知资源。

中国电视剧依托中国文化传统中故事性审美情趣的广泛积淀,凭借电视媒体的强大传播作用,现已无可替代地成为当代最具影响力和渗透力的文化样式。收看电视剧成为我国家庭最普及的文化生活;播放电视剧成为电视发挥公共服务主平台作用不可或缺的内容;热议电视剧成为不分年龄与文化、精英与大众、城市与乡村的共同话题。影响力和渗透力,意味着电视剧作为主流文化载体责无旁贷的文化责任。热播和热议,要求电视剧更加主动自觉地唱响代表时代发展方向,体现社会进步要求的主旋律,通过大众喜闻乐见的审美样态,形象而有感染力地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呼唤人间真善美,引领大众精神取向,构建社会和谐风尚。本届“飞天奖”的评选,再次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题图为《士兵突击》剧照。)

毫无疑问,电视节目主持人是当今社会颇具影响力的人群之一。借助大众传媒的影响,主持人成为公众人物。他们的角色因此不同于普通人,而是集社会角色、媒介角色及个人角色于一体的特殊角色。选择了这一职业,也就不仅仅意味着选择了鲜花和掌声,财富和荣耀,更意味着选择了媒体和社会必然赋予他们的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视在内容生产上大体经历了“宣传品”、“作品”、“产品”三个阶段,与此相应的是,电视节目主持人也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和特征。

在电视内容生产以“宣传”为主导的阶段,电视节目主持人以“宣传员”的形象,出色地完成了党和政府的宣传任务,总体上呈现出激昂奔放、大气磅礴的时代风貌与特征。

在电视内容生产以“作品”为主导的阶段,电视节目主持人呈现出个性化、职业化、专业化特点。他们对于节目、栏目甚至是频道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工种”,初步形成了多样化的主持人类型,并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主持人的语态、姿态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从高调、生硬走向朴实、柔和;从居高临下走向人性化、个性化和日常化。而到上世纪 90 年代,《东方时空》节目推出了一批优秀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他们以各具特色的风采造就了电视节目主持人的空前影响,在中国电视成长为当代第一大众传媒的进程中产生了不可替代的重要推动作用。

在电视内容生产以“产品”为主导的阶段,中国电视整体步入了市场化的快车道。尤其在民生新闻、综艺节目、谈话节目和各类专栏节目中,一批深受观众喜爱的主持人成为了极具市场号召力,并推动中国电视产业化的标志性符号。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他们成为了媒体和社会竞相争夺的稀缺资源。

由于电视节目主持人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因此,在全球化和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他们理应担当起应有的文化责任、社会责任和媒介责任。

数千年的中华文化的深厚积淀,不

仅是全球华人之为骄傲的重要文化资源,也是全人类为之骄傲的重要文化资源。从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中汲取营养,并将其发扬光大,覆盖全球,使世界共享中华文化的魅力,获取中国文化智慧的滋养,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在这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电视节目主持人拥有独特的社会资源,面对社会与群体的种种冲突、矛盾和问题,理应借助电视媒体积极主动地去关注、关怀和关切。尤其是在关乎社会公益的各种活动和场合中,电视节目主持人所秉持的价值观、所倡导的社会行动以及自身的社会行为,都将有效地沟通、交流、协调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害关系,在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的建构中扮演积极、正面、健康的形象。

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发展与提升离不开所依托的电视媒体的发展与提升。如何利用自身的传播优势来推动电视媒体在世界传播力的提升,关乎大局。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以高度职业的精神、负责任的态度,连续奋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公开透明、全面及时、富有人性化的报道,赢得了国际评论界和世界观众的广泛好评,也为中国电视主持人、中国电视媒体良好形象的树立乃至良好的国家形象、民族形象的树立做出了重要贡献。北京奥运报道是对中国电视媒体的一次集体历练,可喜的是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在这次报道中,尽职尽责,经受住了考验,创造了优异的成绩,为提升中国传媒的公信力、影响力、传播力作出了积极贡献,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向全中国、全世界的电视观众交上了一份圆满的答卷。

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电视节目主持人在中国电视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写下了辉煌的篇章。今天,作为中国电视媒体走向世界的生力军,电视节目主持人在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提高中国传媒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方面理应担当起更重要的责任。



回到常情更动人

——《锡林郭勒·汶川》观后

王一川

羊羊千里奔波汶川地震灾区,在废墟上苦寻刚结识不久的四川朋友一家的情景,久久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自从“5·12”汶川大地震以来,运用电影手段记叙全国人民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事迹,就成为广大电影工作者的自觉责任和共同心愿。但是,有时尚常常欲速则不达。几部直接讲述抗震救灾事迹的影片,虽无不道理地要急切地履行电影工作者使命感,但却往往像新闻报道或纪录片那样直接模拟各级组织和个人等如何指挥、协调和参与抗震救灾,而忽略了充分地利用电影虚构手段及其创造的艺术形象去感动人。而看到《锡林郭勒·汶川》,我眼前终于一亮。

这部影片可以总结的东西虽然很多,但我想离不开下面的一点:不像其他一些抗震题材影片那样试图“史诗式”地和“全方位地”展示抗震救灾事迹,而仅仅选择一对蒙汉家庭的平常相遇及友情故事来展开,寓奇崛于寻常。来自

如何从陌生到熟悉,从尊敬到相亲,再到难以割舍的亲情的建立,那么,后半段则转向叙述生者家庭如何心急如焚地牵挂、寻觅死者家庭,直到伤心欲绝地在废墟上哀悼他们。影片巧妙地在这种人之常情

常理及其突转入手去讲述博大精深的国情、浩瀚无边的举国大爱,凸显大灾难冲击下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爱心,从而才出现了小中见大、平中出奇的美学效果。确实,影片的高明处就在于,没有通常抗震救灾片所难以避免的大话和套话,整个叙述过程来得自然、平实,只是随着自然灾害的突然发生而才转向神奇,从而取得了感人肺腑的效果。

这部影片的成功告诉我们,反映全国人民抗震救灾这类重大历史事件的电影,并非一定要直接讲出什么深刻的大道理来,更不一定非有什么大投入、大制作、大场面不可。这类影片真正急需的反面恰恰是讲述来自生活深处的常情常理,而正是这些常情常理可能蕴涵着对我们的生活来说极其宝贵的至情至理。因此可以说,回到常情才动人。这正是这部影片在当前最可宝贵的启示。

《中华达人》呈现民间文艺

以呈现民间传统文艺的电视栏目《中华达人》9月4日起在山东卫视黄金时段播出。节目由国家广电总局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电视台联合主办。

节目通过荧屏将遗落在街头巷尾的民间传统文艺呈现在观众面前。活跃在《中华达人》舞台的不仅有民歌、民俗、绝技、杂耍等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节目形式,更不乏山东阳信哈拉虎、陕西老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为支持节目选拔出的扶植优秀民间文艺项目,山东广电局以《中华达人》节目为契机,发起建立了总额为 100 万元的“民间文艺专项扶植基金”。

(舒平)

电视剧《瑞莲》即将播出

电视连续剧《瑞莲》近日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这部由张有齐导演,马苏、普超英、杨紫茱主演的电视剧即将于今年 12 月和观众见面。

本剧是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和澳门回归 10 周年的献礼片,也是澳门历史上首部大型长篇电视连续剧。该剧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澳门为故事背景,讲述一段人生的悲情励志故事,展现澳门人的精神。

(冯欣欣)



八十年代的青春故事

尹鸿

我们还能想象,上世纪八十年代,劫后余生的中国是怎样一个激情飞扬、万象更新的年代。“希望的田野”、“甜蜜的生活”、“我们都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与伤痕、反思、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四个现代化等词语一起,构成了那个时代日新月异宏伟背景。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八十年代》,从某种程度上说,表达的正是曾经从这个年代走过的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也是对一个民族所经历的特殊青春时代的历史记忆。

作品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抱有宏大的史诗叙述的野心,甚至也没有刻意去折射和表现那个风云变幻时代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和背景,而是叙述了在那样一个不平凡年代中的一群平凡的“小人物”的故事,叙述了他们这样一群年轻人的一段青涩而淳朴的成长岁月,成为一部风格独特、风味特殊的具有年代感的青春偶像电视剧。也许正因为如此,作品显示了更多“自叙”特点。从容地将故事的空间封闭在一座普通的工厂,甚至封闭在四车间这样一个更具体的空间中,将故事的重心从一开始就集中到段玉刚与他的工人兄弟姐妹们身上,依靠对人物性格、心理、行为和环境的还原,使整个电视剧人物集中、性格鲜明、线条清晰、命运跌宕、节奏紧凑,特别是生活质感细腻,一方面唤起了观众对那个年代时代氛围的感性记忆,另一方面也拉近了观众与 20 多年前的历史的时空距离。对于电视剧来说,特殊时代的人生也许比特殊时代更具有人生况味和艺术况味。正如有观众在论坛上所言,“80 年代是我们一生中最纯真、最难忘的时光,看到剧中这些青春昂扬、热血沸腾的男、女青工,犹如我们当时工厂里的兄弟姐妹,那么熟悉,那么情深义重,让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不由得勾起属于自己的青春回忆。”

在那个远比今天更单纯、更简单、更少物质诱惑的年代,如同班级、街道、机关一样,电视剧中的车间班组像一个大家庭,虽然也有利益冲突和性格矛盾,但却温暖而淳朴。电视剧提供的也许不是那个大时代的最典型缩影,但却用一个工厂、一群师徒、一种友情、一段爱情,提供了那个时代的生活质感。而这种质感首先就是由电视剧中一群鲜活的人物形象所完成的。由夏雨饰演的青年工人段玉刚,一个被当作“头儿”的小青年,用剧中的台词来说,是一个“混蛋好人”,一个典型的草根老

大,无拘无束、无规无矩、无惧无畏,同时又侠骨柔情、见义勇为、浩然正气。这种草根英雄的气质,在电视剧中被演绎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段玉刚不仅成为那个特殊年代的所谓“小混混”逐渐成长的代表,也成为一种特立独行的青春偶像的象征,塑造了一个特殊的八十年代人物,也塑造了一个特殊的具有性格魅力的青年形象。

这部电视剧尽管没有刻意去呈现那个年代的各种重大的典型历史事件,但是,却成功地还原了那个时代的生活氛围。朦胧诗、28 自行车、蛤蟆镜、喇叭裤、连衣裙、高考等各种年代标记都浸透在故事的叙述过程中。特别是各种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既是活生生的“这一个”,同时也是那个特定历史舞台上的典型人物。绰号叫“脆弱”的技校毕业生闻安对“大学”的向往,大注试图当上技工告慰父母的心志,秦光明作为那个年代中的于连式的人物在冠冕堂皇的自我伪装下的“小人行径”,精于钱财的老兄弟下海经商的命运转折,特别是“小寡妇”丁惠茹在那个时代因为所谓的“男女关系”所遭遇的社会道德困境,由左小青饰演的多少带有那个年代人们共同的梦中情人烙印的知识女性满晓星的情感经历,以及按照那个时代的戏剧道德让丁惠茹成为爱的殉葬品的情节设计,都是那个时代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生动再现。这些人物和他们的命运共同构成了年代的质感和生活的质感,也带来了电视剧的生气勃勃。

人物活则故事活,故事活则电视剧活。尽管这部电视剧在追求戏剧完整性的同时多少还是牺牲了一些大历史背景的丰富性,青春偶像剧的类型追求也使段玉刚和满晓星似乎过于“偶像”而失去了某些现实主义力度,但是,电视剧的人物、故事或是氛围,都提供了一种鲜活而生动的艺术体验。据说,这部戏的编剧、导演和制片人都是同龄人,是剧中所描述年代的亲历者。所以,他们创作电视剧的同时其实也是叙述他们自己的青春岁月。段玉刚的成长是那些没有机会进入大学改变命运的多数人的成长记忆和命运轨迹,有了他们,那个年代的记忆才更加完整。而影片最后用舒婷的《致橡树》所表达的则是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尊严、爱情、人格的致敬。那个年代所表达的单纯而坚定的情感,在物欲横流、人心浮动的社会,是那么稀有和值得留恋。因而,《我们的八十年代》不仅是过去的回忆,也是今天的镜子。